

ZENG GUO FAN QUAN SHU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曾国藩全书
ZENG GUO FAN QUAN SHU



远方出版社

曾國藩與天津教案



目 录

一、奉旨赴津办案留遗嘱	(1)
二、天津教案纪实	(4)
(一) 总 述	(4)
(二) 教案发生	(6)
(三) 曾国藩受命	(9)
(四) 独吞外交苦果	(10)
(五) 声望一落千丈	(13)
(六) 弱国无外交	(15)
(七) 两难的选择	(15)
(八) 天津教案收获	(16)
三、洋人眼里的天津教案之得失	(18)
四、民心不可侮	(22)
五、相关史料	(27)
(一) 日记篇	(27)
(二) 家书篇	(75)
(三) 奏稿篇	(94)
六、权威评价曾国藩	(156)



1. 打死洋人	(156)
2. 皇帝谕旨	(158)
3. 临危受命	(158)
4. 全力主和	(159)
5. 教案真相	(160)
6. 折衷理案	(162)
7. 据理力争	(163)
8. 违心办案	(165)
9. 身败名裂	(166)

七、结 语	(168)
-------------	-------

附录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	(169)
1. 外国基督教的传入	(169)
2. 传教士的劣行	(179)
3. 衡州教案及其它	(183)
4. 我国近代史上的几起重大教案	(190)
5. 关于“庚子教案”	(193)
6. 曾国藩家乡教案案例选	(205)



一、奉旨赴津办案留遗嘱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中间虽有临清至张秋一节须改陆路，较之全行陆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来之书籍、木器等过于繁重，断不可全行带回，须细心分别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毁者焚毁，其必不可弃者，乃行带归，毋贪琐物而花途费。其在保定自制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摺，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处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伎不求为重。伎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



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





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二、天津教案纪实

(一) 总 述

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起因是天津境内，常有小孩被迷拐的事情，并且传说失去的小孩，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拐，把他们挖眼剖心，取而制药，因此民众与教徒常有争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津办理外交已有十年，可说是外交老手，他约法国领事官到署，提犯人对质，民众愤怒，领事丰大业恐怕吃眼前亏，竟然开枪杀人。民众大怒，把丰大业活活打死，并放火烧教堂，使洋人和教民无辜受害者达数十人。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驻保定，奉朝命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曾国藩未曾办过外交，而此案之发生双方皆有不是之处。曾国藩在此情况之下，万分为难，因为当时的“清议”是颇有力量的，而本人对外情未悉，不知如何做起，如果办理不善，引起战争，弄不好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掳去。所以他在动身之前，先写下遗嘱，并作家书示其二子处理后事，又写下“遗教”一篇，告诫二子，有云：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





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可言的，洋人恃其兵船大炮，威胁中国，中国处处都居于下风。天津教案既起，惧外的清廷生怕又再发生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之事，便谕示曾国藩、崇厚，不可太过强硬，以免引起交涉破裂。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初开，事事谦让。曾国藩到天津后，见崇厚太软弱，而士大夫的清议又高呼攘夷，主张立刻开战，使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只想在万不得已时一死以谢国人。

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之前，津京地区的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对其在卫道中不惜以杀人为业、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鲜血的行为大为赞叹，希望他能够借助津民对洋人的愤懑，驱逐洋人，或调兵遣将，不惜孤注一掷，或请求联合英俄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或参劾崇厚的“柔弱”外交以伸民气。但曾国藩从保定动身前，就确立了“中国实力不足同外国抗衡，只有力保和局才不致于开仗”的外交路线。

基于以上的认识，曾国藩一到天津便发布文告，警告天津绅民不许滋事、扩大事态，即而又列数了“五疑”，为洋人“伸腰”。奏折在内阁抄发中披露以后，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谩骂纷至沓来。

朝廷中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顽固派，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了民族的利益，以人心所向于不顾。曾国藩认为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是“持攘夷之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理彼己，统筹全局，为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曾国藩这一席话，确实道出了当时的时弊。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除了曾国藩的议结方式，



别无其它选择。但却在国人面前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发出了“持平”，“不构衅”的模糊指令，形成了一种和具体承办者在津案问题的见解上有异议的形式，这就不难理解，当全国舆论大哗，人言鼎沸的时候，由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实际上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且看李鸿章接办的结果，仅将原判 20 名死刑改为 16 名，四名为缓期，其余一无更动。显而易见，“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国藩已“尽天理人情之至。”

（二）教案发生

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基督教在传入的过程中是以侵略、扩张为先声的。鸦片战争以后，天津成为法国人主教遣使会的传教区，归属北京主教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法国传教士充当法军翻译。法军撤离天津以后，其驻地望海楼就成为传教士传教之所。由于传教士是同侵略军一同踏上天津这块土地的，这就使得天津绅民们自始便对传教士与侵略者联系在一起，本能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敌意。

咸丰六年（1856 年），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来天津任主理司铎，这标志着天津的传教工作开始有所发展。当时，天津的天主教的传教工作，主要依靠仁爱会的修女所办的仁慈堂来开展的。

天主教会兴办育婴堂，是扩大天主教会的影响、发展教会势力的手段，同时也是为教会谋取钱财和获得传教经费的途径。天主教打着救护中国婴孩的招牌，从欧洲募集大量捐款。这样各种捐款便分拨到在华的各教会作为经费，于是各地的育婴堂大量增加，所收养的婴孩数字也在与日俱增。

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靠中国百姓送养或收容是难以办到



的，因为中国百姓宁肯将抚养不起的婴儿送人或溺死，也不愿送到洋人所兴办的育婴堂里。因此，传教士或修女为了追求育婴的数目，不问来路，遂使一些教民与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用卑劣的手段拐骗幼孩，送入育婴堂。随着育婴堂里婴儿数字的日益增加，原有的房屋便不敷使用，数百名婴儿居住在一起，传染病肆虐，往往出现一批批婴孩死亡的现象。

同治九年（1870年）的春夏之交，传染病在天津流行，仁慈堂的婴孩死亡率骤然增加，仅在20余天里，就有40余名婴孩死亡。堂里难以一一殓殮，遂将二三具婴孩的尸体装入一个洋货箱内，在夜间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五月六日（6月4日），河东义地中有一棺被野狗扒出，内有两具尸体，尸体白外腐烂。一时间，天津城内舆论大哗，继而人们又陆续掘出一些木箱，都是一棺数尸，尸体模糊难辨，有的只剩下毛发和骨头，于是民间流传的“挖眼剖心”遂有了所谓的物证。天津官绅百姓被激怒了。

两天后，人们在西关捉到了由静海诱拐孩童来津的张栓、郭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鹰洋”，并供认是望海楼仁慈堂的仁慈贞女付给他们的诱孩身价。接着在五月二十日（6月18日），挑花村居民将19岁的武兰珍扭送至官府，控告其迷拐村民。天津知府张光藻在审讯时，武兰珍当堂直供，声称是被教民王三迷入教堂，然后命他用迷药诱拐幼孩，拐一人付给洋钱五元。

此事哄传开去以后，街巷市民，纷纷议论，各种浮言大致涉及望海楼的仁慈堂。群情激愤，人们纷纷要求逮捕拐案主犯、教民王三，甚至于人们把疑惧、愤懑、仇恨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津民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外，要求进教堂进行核实。法国大使丰大业蛮横无理地拒绝了人们的要求，声称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外，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崇厚及其他天津地方官员与法国大使往



来交涉后，定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上午带武兰珍到教堂进行对质。结果一无所获，来往官员身后总是聚集着成百上千的围观群众。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驱赶围观群众，崇厚只派几名巡捕官前往，以规劝群众。丰大业恼羞成怒，自己带领随从将巡捕官赶走，随即携带着两支洋枪，与手持利剑的秘书西蒙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于是围观群众又拥向了通商署。

丰大业一进通商署，便大发雷霆，对准崇厚拔枪就打。说时迟，那时快，差役一把将崇厚推开。于是，丰大业与西蒙东敲西砸，通商署里一片狼藉。此时，天津知县刘杰闻讯赶来，规劝群众散开。可是，丰大业一见刘杰，不分青红皂白，对准刘杰就是一枪，刘杰急将身子一闪，子弹射中了他的随从高升，造成血案。愤怒已极的民众，再也无法控制，他们一拥而上，将两个暴徒当场打死。

午后，天津城里盛传中国已同法国开战，有人立刻鸣锣聚众，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人们冲进了望海楼和法国领事馆，杀死了他们所遇见的所有的外国人，除丰大业、西蒙以外，又杀死了领事馆里的两名随从，传教士谢福音，十名修女（有两名比利时籍，一人意大利籍，一人为爱尔兰籍），法国居民二名，俄国居民三人。此外，还有一名吴姓的中国神甫。人们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整个事件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火烧望海楼事件发生以后，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七个国家，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各国军舰云集在天津海面上示威。他们要求清政府镇压天津民众，惩办地方官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刘杰等人抵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 曾国藩受命

曾国藩就在这样一种十分窘急的情况下，来天津处理这起教案的。

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清政府将一个烂摊子推给了曾国藩，使其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之下，无从下手。

当时七国军舰停泊在大沽口外，以军事威胁清政府惩办天津地方官及民众，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同撤往上海，拉出断交开战的架势。

天津民众在案发当天，出于义愤，一哄而起，杀洋人，烧洋楼，“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曾国藩由保定到达天津以后，绅民们的反教狂涛并没有平息，盛传曾国藩是由朝廷派来天津驱赶洋人的。

六月七日曾国藩到达天津，面对着业已十分高涨而偏激的民众情绪，如果进一步加以鼓励，势必会造成一场盲目排外的群众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针对法国教堂及其传教士，而且会波及到所有的外国教堂、传教士以及外国人，最终酿成一场新的战端。

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的中国，国力孱弱已极，一旦“衅端一开”，必定是“全局瓦裂”。

很显然，在这场中外交涉中，曾国藩奉行的是实力外交。但他不同于以往的实力主义，只认识到了中西实力相差的悬殊，而对自己和民族没有信心。

作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指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过来人，曾国藩最终在一片狂热的主战声中冷静下来，务实成为



他外交的砝码。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所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士大夫的妄自尊大和军备的悬殊差距，这面对着西洋的坚船利炮未免不合时宜。

因此，避免战争、在关键问题上拒绝侵略者的要求，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保护本国的利益，成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不管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

（四）独吞外交苦果

曾国藩到达天津以后，从调查入手，以弄清案情的真相。经过对王三的审问，虽然他供认授药武兰珍，然而却时供时翻。在调查仁慈堂里被查出的 150 余人时，全都说是由家人送至仁慈堂供养的，没有被诱拐的情况。人们仇恨所在的“挖眼剖心”一事，则查无实据。

调查津案的始末之后，曾国藩详尽分析了天津绅民对教堂产生迷拐幼童挖眼剖心谣传的原因：

“盖见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下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



人。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适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宗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既然对法国教堂残害中国幼童这一要害问题查无实据，那么就形成了“审虚则洋人理直”的局面。这就为查处天津教案定下了基调，“若其曲不在洋人，则津民为首滋事者尤须严查究惩，……力求平允，以服中外之心”。

基于以上的判断，曾国藩以“诚信”为外交方针，在办案中自始至终持妥协的态度。

曾国藩在处理法国与其它国家的问题上，采取了分别处理的方式。“拟先将俄国误杀之人及英美误毁之教堂，速为料理，应赔偿者先与赔偿，不与法国一并议结，以免歧混”。这一处理的结果，使得法国难以同其它国家串通一气，对中国采取联合性的军事行动，不致扩大事态。

关于府县抵命问题，是争执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法国公使罗淑亚叫嚣，一定要让天津的三府抵命。

曾国藩对天津府县张光藻和刘杰始终力加袒护。他刚到天津，便准二人请假逃离津城，一个去了顺德府，一个避到密云。



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谴责曾国藩不应该让他们离开天津，并命令星夜将他们押回天津。在审讯期间，张刘二人本应监禁，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并且时常到曾国藩府中做客。英国公使也曾向清政府指责承审官员以酒宴款待二人。

对于法国公使要求杀府县抵命的要求，曾国藩坚决抵制不办，当他获悉普法战争爆发的消息以后，信心很大。但是，在普法战争爆发以后，罗淑亚为获得主动权，便匆匆赶回北京，通过美国公使的斡旋，与普鲁士在远东保持联合行动。普法战争并没有减轻曾国藩处理教案的压力。

缉凶是办案的一个难题，在外有列强，内有清政府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虽然有所抵制，但却一再的让步。曾国藩在来天津的路途上，就感到“缉凶”的困难。虽然一到天津便派人缉查，但那些参加杀洋人烧教堂的人，早已藏匿起来。在限期迫近、朝廷催逼的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改变缉“凶”人数与被杀洋人数大致相等的初衷，为拼凑“正凶”人数，不得不变通律例，只要是打过洋人或只要有二人以上的旁证，都以“正凶”定案。

曾国藩在被调离直隶总督任之前，终于向清政府和国人呈上了他议结津案的方案：

- 一、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
- 二、判处所谓“凶犯”二十名死刑，充军流放者二十九名；
- 三、赔偿及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

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论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还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有人竟作对联一副讥讽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五）声望一落千丈

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之前，京津地区的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对曾国藩在卫道中不惜以杀人为业、对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鲜血的行为大为赞叹，希望他能够借助津民对洋人的愤懑，驱逐洋人，或调兵遣将，不惜孤注一掷，或请求联合英俄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或参劾崇厚的“柔弱”外交以伸民气。但曾国藩从保定动身前，就已经确立了中国实力不足与同外国抗衡，只有力保和局才不致于开仗的外交路线。

基于以上的认识，曾国藩一到天津便发布文告，警告天津绅民不许滋事、扩大事态。即而又列数了“五疑”，为洋人“伸腰”。奏折在内阁抄发中披露以后，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谩骂纷至沓来。

朝廷中的顽固派，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了民族的利益，置人心所向于不顾。曾国藩认为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是“持攘夷之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理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曾国藩这一席言论，确实道出了当时的时弊。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承认，除了曾国藩的议结方式，别无其它选择。但却在国人面前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发出了“持平”、“不构衅”的模糊指令，形成了一种和具体承办者在津案问题的见解上有异议的形式。这就不难理解，当全国舆论大哗，人声鼎沸的时候，由李鸿章代替曾国藩，实际上是起到了转

